

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与近代山东西医科学

(1860-1937)

(中文摘要)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依据不平等条约，西方基督教教会纷纷涌入山东。新教传教士们在山东建教堂、发展教徒，并从事“慈善”活动，其中“医药卫生事业”是传教士们活动的重点，在传教过程中他们把西洋医学传入山东，在山东的土地上建诊所、医院，开展西方医学教育。截至1937年，新教传教士在山东共建了20多所医院，创建了山东正规的医学教育院校。在收集大量中英文资料的基础上，本文对新教传教士在近代山东的医药活动作了一次较为全面的论述和分析，试图从整体上做出较为客观的评价，总结在特定政治、经济历史背景下，特定地区的医药卫生发展特点，阐述中西医药交流对近代山东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和对发展山东医药卫生事业的现实借鉴作用。文章共分六大部分：

一、新教传教士在山东传教行医的时代背景。首先介绍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在不平等条约的庇护和山东优越的地理环境的吸引下，欧美各国教会派遣大批传教士来到山东“借医布道”。其次论述了基督教医学传教传统的影响及西方医学取得重大进步，认为这些条件为教会在山东开展医药事业提供了强大的支持。

二、分析论证新教传教士在山东行医的原因，认为适应近代山东社会是基督教新教在山东兴办诊所、医院的重要原因。近代山东医疗卫生状况落后，医药是广大山东民众所需要的，行医成了传教士接近民众的便利方式，对打开传教的大门有重要作用；同时，传教士的健康问题也是一些差会兴办医药事业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三、概要介绍传教士在山东的医药活动。通过对零乱中外文史料的爬梳整理，认定近代山东新教传教士的医药活动可分两大时期：一、1860-1900年，是为教会医药活动的产生和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各差会纷纷举办自己的医药事业，但由于受资金、当地民众态度等的制约和影响，大多数规模比较小；二、1901-1937年，是为教会医药活动的大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随着中国社会的开放和国内差会对教会医药事业的重视，教会医院达到数量上的高峰，产生了一些有影响力

的医院。

四、集中重点论述近代山东的西医教育。医学传教士在山东行医过程中看到单靠他们的力量不足以满足山东民众的求医需求，必须创办医学学校，培养山东自己的医生，由是揭开了山东西医教育的序幕。他们先后在山东陆续建立了医学高等院校，培养了一批高级现代医学人才；创办了护士学校，为山东培养了早期的职业护士，同时引导妇女走出家庭走向社会，促进了社会风习的改变。

五、教会医药事业特征分析。重点分析论证了由于各差会自身的力量及对山东的重视程度的差异，导致医疗区域分布、各差会发展及教会医疗活动发展的不均衡性。

六、传教士的医药活动对山东社会的影响。总结探讨了教会医疗事业在传播西方医学和西方文化中的作用。认为教会医疗事业的举办首先将西医文化移植到了山东，使山东人民接触到了近代西医、西药、新式医疗器械、新式医疗技术等；而医学教育和护士教育制度移植山东，则对西医文化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在传播西医的同时，有的医学传教士还研究和使用中医，并向西方介绍中医，为中西医交流发挥了积极作用。当然，依据史实，文章也指出了传教士们的医药活动不可避免地带有宗教传播的烙印，其开展医药活动的目的，则在于传播基督教。

关键词：基督教；新教传教士；近代山东；西医科学

分类号：B975，R19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y and the Science of Western Medicine in Modern Shandong (1860-1937)

(Abstract)

After the second opium war, according to de inequality treaty, the Christian of the western come to Shandong one after anther.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y build the churches and enroll the believer of the religion. In their "charity activities", the emphasis is "medicine missionary enterprise".The modern medicine comes to Shandong by the Missionary. The Missionary build the Mission Hospitals and the dispensaries, also developing medical education. To 1937, more twenty Mission Hospitals are built by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y in Shandong, they also build some medical schools. In the base of collecting Chinese and English datum, the thesis has a general discussion and evaluation for the activities of the missionary. It tries to give an impersonal evaluation from the whole and to summarize the characteristic of medicine enterprises in the given background of policy and economic. The exchange between Chinese and the Occident have the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 modern Shandong, it also have an available influence on the "medicine enterprise" The thesis has six parts:

The first part: The background that the missionary spread Christianity. First, after the second Opium War, in the shield of the inequality treaty and the attraction of the superiority environment, the Western Church send a great deal of missionary to Shandong. They spread medicine by right of the Church. Second, the traditional medicine missionary and the modern medicine have an influence on the "medicin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Shandong.

The second part: The thesis analyzes and demonstrates the cause that the Missionary spread medicine. It thinks adapting to the society in modern Shandong is the most case. Because medicine enterprises drop behind in the modern, yet medicine is needed by the crowd .The spreading of medicine makes for the Missionary approaching the crowd. It is important for the Missionary to open the door in Shandong.

The third part: Medical activities of the Missionary were introduced. According to datum ,the thesis thinks the medical activities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y are divided into

two periods: The first is the outset and development of “medicin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1860-1900. But it is impacted by lacking of the fund and the mass attitudes, the development of “medicin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s weak. The second phases is the high development of “medicine missionary enterprise”. With the society opening and the crowd recognizing, many Missionary Hospitals are built.

The Fourth part: Focus on discussing the western medicine education in Shandong. Medical missionary was cognizant that they did not meet the demand of Shandong people by themselves, and they must set up medical school and train the native doctor. This started the western medicine education in Shandong. They established medical college, and educated a lot of qualified medical personnel. They established nurse school to train the early professional nurses. This led the women go to society from home, and promoted the change of social custom.

The fifth part: The characteristic of “enterprise of medicine missionary”. This thesis laid special stress on analyzing the disproportion of missionary’s medical work by the difference the strength of themselves and the recognition degree of Shandong.

The Sixth part: The influence of “medicine missionary’s enterprise” in Shandong. This thesis sums up the effect of “medicin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spreading western medicine and western culture. It transplanted western medicine to Shandong, and make Shandong people come into contact with modern western medicine, new type medical equipment, new medical technology etc. The transplanted of medical education and nurse education had important role on spreading western medicine.

While spreading Western medicine, some medical missionary research and us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y introduc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o the west, and promote the interchange betwee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Western medicine.

Of course, according to historical fact, this thesis point out that medical work of the missionary inevitably has the brand to spread abroad religion. The purpose is transmitting Christianity.

Key Words: Christianity;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y; modern Shandong ;
the science of Western medicine

Classified Number: B975, R19

独 创 声 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据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为获得_____（注：如果没有其他需要特别声明的，本栏可空）或其他教育机构的学位或证书使用过的材料。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谢意。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导师签字：

签字日期：2004 年 10 月 日

签字日期：2004 年 10 月 日

导 言

19 世纪以来，世界日益从相对隔离的状态趋向各方面相互依赖的整体，在列强资本主义世界性扩张大潮的裹挟下，中国等落后的非西方国家先后被纳入资本主义体系。新的外来因素刺激中国启动了艰难而又不可避免的现代化进程。在诸多外来因素中，传教事业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西方基督教凭借不平等条约的庇护和传教士自身的努力，在近代中国得到广泛发展，几乎遍及全国各地，并在近代中国社会各个领域产生了很大影响。山东作为中国的一个重要省份，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宜人的气候以及集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儒家文化对西方国家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把山东的登州（后改烟台）辟为通商口岸。至此，西方基督教传教士纷纷登陆山东，传教士们把医药事业作为传教的重要手段之一，在山东各地设诊所、医院，开展医学教育等，西医科学在山东生根、开花、结果。在近代，来山东的西方传教士，总体而言，以习称基督教或耶稣教即新教传教士为主，旧教即天主教虽历史悠久但实力相对弱小，活动范围远不如新教。本文专论新教传教士与西医科学的关系。

我们在此对新教传教士在山东的医药活动作动态的辨证研究，对他们在山东的医药活动进行全面的考察。了解新教传教士群体在山东的医药活动对山东医学、医学教育及山东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无疑有助于我们对近代来华传教士进行比较客观的评价，恰当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正确对待外来文化，推动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

在山东教会医疗事业的专门研究方面，医学史界早经重视，并作了最初的研究。研究论文较早的有杨华祥等：《近代西洋医学传入烟台概述》，论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洋医学随同西方国家宗教文化的渗透传入烟台及在烟台的各项医药活动；陈军：《潍坊地区西医的传入》，论述西医传入潍坊的情况。史学工作者的专门研究起步较晚。在个案研究方面，有学者对个别医学传教士与教会医院、医学院校作了研究。在教会医学院校的研究方面，杨懋春、褚承志等对齐鲁大学医学院做了深入的研究；在教会医院的研究方面，李钦堂等对青岛信义医院，董俊菁对济南最早的几家医院做过一定程度的研究；关于教会护士教育，史学界尚缺乏研究。山东近代传教士的医药卫生事业的研究，山东大学的陶飞亚、刘天路的《基督教会与近代山

东社会》一书，把基督教与山东近代医药事业作为一个章节作了介绍；朱小俐在其硕士论文《女传教士在山东》一文中，只提到女传教士在山东进行的医药活动及进行的医学教育。就现已查阅到的资料看，尚无全面系统论述近代山东地区西洋医学随传教士传入并获得较为普遍发展的文章问世。

本文论述的时间跨度为 1860-1937 年。这主要是由于新教传教士正式登陆山东始于 1860 年，1937 年日本侵略者大举侵华，许多传教士纷纷回国，由传教士所建的医院、学校有的停办或者被日本人所占领，山东的情况也是如此。像黄县的怀麟医院、掖县的梅铁医院都在 1941 年被日军接管，而著名的齐鲁大学，在抗战期间，“学校和医院均被日军接管，所有美籍教授和眷属，部分本国籍医生都被关进了集中营。”^[1]在这种情况下，新教传教士们很难在山东继续开展医药活动。

本文主要的创新之处有：（一）在深入挖掘新史料的基础上，全面动态地考察了山东教会医疗事业的产生和发展及其对近代山东社会的影响，凸现了历史发展的变的特征，弥补了关于传教士护士教育研究的缺憾；（二）在具体研究中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探讨了西医传播对近代山东观念的影响，并特别考察了近代山东人的西医观念的变迁，揭示了近代山东妇女观念的一些独特层面；认为教会医疗事业促进了山东医疗事业的现代化；（三）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力求借鉴和运用宗教学、医学史等学科的方法，从交叉学科的新视野对教会医疗事业作动态、系统的研究；（四）在广泛搜集资料的基础上，统计并运用大量表格的形式来说明一些问题。

另外，由于涉及这一研究领域者寥寥无几，几无可借鉴的研究成果，加之本人学识有限，不足之处，敬请师长指正。

一、时代背景

（一）国内背景

1、新教传入山东

基督教开始在中国传播，最早可追溯到唐朝初年。^[2]到清朝康熙、雍正时期，传教士在中国秘密传教。新教进入中国开端于 1807 年，英国伦敦会的传教士马礼逊成为近代在华传教的第一位新教传教士。以后，美、英、德等国相继派遣传教士来华，新教在华传教事业由此开始。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通过军事侵略、外交讹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外国传教士开始取得了在通商口岸建立教堂进行传教的权利。这一时期，传教士活动范围仅限于通商口岸，传教活动也受到清政府一定程度的限制，形成所谓的“限教政策”。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门户全面洞开，传教士获得了在中国全境自由传教的特权。限教政策被宗教宽容政策所取代”。^[3]清政府被迫于 1858 年分别同各国签订了不平等的《天津条约》，“在这些条约里，由于传教士的参与策划，全部塞进了容许在中国传教的所谓‘宽容条款’”，^[4]并以“法理的形式”固定下来。1858 年中美《天津条约》第二十九款规定：“耶稣基督教…，嗣后所有安分传教习教之人，当一体矜恤保护，不可欺侮凌虐。凡有遵照教规安分传习者，他人毋得骚扰”。^[5]到 1860 年签订的《北京条约》，“对于各国在天津条约中所获传教的权利，除再予肯定外，并予以进一步的扩充”，^[6]规定传教士可以到内地活动。山东的登州（后改烟台）辟为通商口岸，从此欧美传教士大批涌入山东。19 世纪后期至义和团运动前，新教努力在山东各地开拓活动空间，此为新教在山东扩大实力的时期。最初，各差会开辟工作极其困难。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古老文化的国度，不管是心理和生活方式都与西方不同，因此它遭到了当地士绅、民众的强烈反对，传教士们在山东传播基督教，“其情形恰像把几滴水洒在坚硬的石头上，一丝一毫也渗不进去”，^[7]不过，这并没有阻止新教实力的发展。这些“格格不入”的情形，促使传教士们改变策略，转移阵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乡村去，利用民众朴素的心理，开展传教工作。从 1860 年新教在山东建立起第一座教堂起，至义和团运动爆发前夕，山东境内已建立起 600

多所新教教堂，全省 107 个县份都有新教教会的活动。^[6]而在山东省设立的不同宗派的教会组织也达到近 20 个。就欧美主要差会进入山东开展传教工作的情况介绍如下：

最早进入山东的基督教差会是美国南浸信会。“1860 年，天津条约订立，内中规定中国新开放数口对外贸易，一些一直急切等待这一机会的传教士们，立即启程前往新开口岸。预计到会有这一结果，当现已结束的同中国的战争还在进行时，美国南浸信会本部（the Southern Baptist Board）即任命花雅各（J. T. Holmes）牧师和花雅各夫人为赴山东传教士。”^[9]这年夏天，他们由上海乘船到烟台活动，于 1860 年在烟台建立了山东第一个教会组织。此后，又在登州、黄县、平度建立教会。

与南浸信会差不多同时到达烟台传教的还有英国浸信会。^[10]1861 年美国长老会也开始进入山东，这一年，倪维思（J. L. Nevius）牧师和倪维思夫人从宁波来到山东，他们和梅理士等人在登州建立了长老会第一个牧区。伴随着浸礼会、长老会在烟台建立传教基地，其他差会也开始步其后尘，在山东觅求自己的传教活动地盘。统计先后来山东的新教差会主要有美国公理会、美国美以美会、英国浸礼会、英国圣公会、英国圣道公会，以及德国柏林会和不分国籍的内地会等，他们陆续在山东安营扎寨，设教区、建教堂，发展教徒。总之，到十九世纪末，伴随基督教新教教会来山东数目的增多和活动区域的扩大，他们在山东的传教势力有了较大发展。“到 1900 年，在山东的新教传教士达到 300 余人，教徒 15000 人，另外还有华籍教士 400 余人”。^[11]

2、新教在山东的发展

欧美各主要差会进入山东之后，采用各种方式开展工作，并渐渐被当地一些民众所接受。但传教工作也不是一帆风顺的，1900 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使教会创建的很多教堂、学校和医院遭到破坏，许多新教传教士撤离山东回国或逃到沿海地区。义和团风波平息之后，他们又重新回来开展工作，至此新教开始了在山东各地扩展势力。到辛亥革命前，山东新教差会在山东共建了 148 座教堂、发展信徒 21947 人、创办学校 581 所，在山东的传教士 325 人。主要差会势力发展情况见表一：

表一 1910 年欧美主要差会在山东传教情况统计

各国差会	教堂	教徒	学校	外籍传教士
美国长老会	58	8962	187	69

美国南浸信会	14	2639	94	50
美国公理会	32	1484	18	17
美国美以美会	6	631	71	11
英国圣公会	5	915	12	24
英国圣道公会	149	1960	43	10
英国浸礼会	17	4242	122	47
中国内地会	无统计	100	3	32
瑞典浸信会	7	297	7	5
德国柏林会	3	817	13	13
弟兄会	4	100	2	16

资料来源：据 Shantung, The Sacred Province of China in Some of Its Aspect, Compiled and Edited by Robert Coventry Forsyth,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912, P. 229-285；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山东省志·少数民族志·宗教志》统计

根据表中的数据，英美差会在山东发展的势力比较大，其它小的差会相对来说弱一些。对于这时期的新教势力迅速发展的原因，杨懋春曾撰文说“庚子之后，反教风潮渐次平息，人民与教会心无隔阂，加之教会改变策略，在各地举办学校、医院及博物院等，深得人民赞赏”。^[12]另外，德国强占胶州湾以及德国势力在山东的扩张，也是基督教在山东得到迅速发展的原因。至此，山东基督教新教势力进入了黄金时期。

民国初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对宗教问题采取了更开放的政策。”^[13]孙中山颁发的《对外宣言》、《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人民有信教之自由”。为防止教会对中国政局的干涉，孙中山提倡在中国实行“政教分离”。他还在1912年3月致函教友康德黎夫人时指出：“我们正在谋求中国实行宗教自由，而在此制度下基督教必将昌隆繁盛。”^[14]在这种氛围下，基督教获得了大发展的机会。到1920年，全省信徒人数居全国第二位，仅次于广东，共四万一千八百二十人，占全国信徒总数的12%以上。^[15]在山东的新教传教士人数居全国第五，教会中小学校数量在全国居第一位。在其它的一些能够反映教会势力的方面，山东新教差会在全国也大多是名列前茅。具体情况见表二：

表二 1920年西方主要差会在山东的传教情况统计

各国差会	美国长老会	美国南浸信会	美国公理会	美国美以美会	英国圣公会	英国圣道公会	英国浸礼会	中国内地会	瑞典浸信会	弟兄会
教堂	60	59	10	51	34	55	345	2	4	5
教徒	14789	11106	1542	2484	1275	1912	5983	173	1217	304
学校	454	234	32	54	50	18	33	2	52	11
传教士	135	58	26	16	29	6	61	2	13	19

资料来源：据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山东省志·少数民族志·宗教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1901-192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23页统计

20年代之后，新教势力继续发展，到“七七事变”爆发前夕，据不完全统计，各差会共有外籍传教士364人，中国布道人员1892人，教徒7万人左右。^[16]

基督教作为一种文化势力，在山东的布道过程实际上是一种文化传播的过程，是一种异质文化在另一种文化环境中的再发展。这种异质文化在山东的成功传播，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山东社会的需求和民众利用的能力。应当承认，新教在山东的布道活动是卓有成效的。新教教会的教育、医疗及其慈善事业，吸收了更多的人皈依基督教，尤其是教会的医疗事业，对于“缺医少药”的劳苦大众，他们“施医舍药”的手段更是具有吸引力。

3、山东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新教传教的重点区域

首先，山东濒临黄海、渤海，“控制北洋门户”，登州为清政府军事重地，登州以东的烟台，为山东半岛北岸青岛开埠之前的最大商埠。其次，山东气候宜人，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又是孔孟故里，被称为“中国之圣省”。^[17]对此，英国传教士阿姆斯特朗（Alex. Armstrollg）在其《山东》一书的序文中也指出：“山东为中国始终最有兴趣、最可纪念诸省之一”。这就决定了近代山东“既是帝国主义进行政治控制和经济扩张的战略要地，也是西方基督教会开展宗教活动、发展教会势力的重点区域。”^[18]

纵观新教势力在山东占据重要地位的原因，一个是由于山东人口众多，地理条

件优越，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新教差会对在山东传教的高度重视。美国北长老会的传教士狄考文曾经说过：“我感到我要用全力表示，让长老会攻打山东这个省份。在过去的时代里，中国的宗教与政治都是由山东产生，在将来的岁月里，它要把基督教贡献给中国。”^[19]

（二）国际背景

1、基督教医学传教的传统

一般而言，很多流布很广的宗教在它的传播过程中，除注重“灵魂拯救”外，还注重“社会拯救”，施医给药就是其中的一种方式。宗教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作为一种福利机构为社会提供服务”。^[20]施医给药在一定程度上是这种功能的反映，而且“使福利与服务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程度”是某一宗教群体赖以存在的前提之一^[21]。施医给药不仅可以体现宗教的爱人之心，而且可以引起人们对某一宗教的好感。正因为如此，治病救人成了众多宗教传教的通用方式。我国的道教也相当注重医药。与基督教相比，佛教的医疗组织则有更早的历史。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相当注重医药，一些寺院不仅在疾病流行时进行施医，而且还创办病院。同样，基督教的传教与医药也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在基督教创立之初，耶稣就曾通过治病来传教。《圣经》中的《马可福音》、《马太福音》都有耶稣传教时给人治病的记录，耶稣还教他的门徒给人治病以传教。近代来华的伯驾等医学传教士都说来华行医传教是因为耶稣基督言行的教诲。

从历史上看，基督教在唐、元、明清之际先后三次传入中国，每次都注重利用医药进行传教。元代的也里可温对医药传教相当重视，在北京等地设立医院，有的教徒在河南建立教堂，“同时兼行医术”。^[22]明清之际的耶稣会士在华传教时注重天文、历法、算法，对医药也相当看重。1569年，卡罗内在澳门创办了圣拉斐尔医院。明末，利马窦在华的第一个信徒就是他用医药治好的一位中国人。清初，不少传教士精通医药，他们利用医药为帝王、大臣以及贫民治病。如洪若翰、刘应曾用金鸡纳为康熙帝治过病。这一切都为明末清初传教提供了方便。从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历史可以看出，基督教在传教时对医药的利用是相当重视的。他们的这些行医传教活动为后来的基督教新教医学传教士提供了榜样。

2、近代西方医学的发展

文艺复兴以来，随着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西方医学取得长足进展。西方先进

的医生开始寻求疾病的本质，脱离背诵或口头辩论古典医学来面向病人。在生理学上，哈维的血液循环不仅被承认，而且被运用到医学实践。继此之后，病理学、细胞学说、细菌学、诊断学、临床学等都先后发展起来。在诊断器具上，一系列的发明为正确诊断提供了可能，如听诊器、显微镜、X光机等发明和利用大大提高了西方医疗的诊断水平。西医日益走出传统的希波克拉底理论的影响，实现了从神秘向科学的转变。19世纪以来，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和产业革命，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使生产力大大提高。经济的发展，推动了自然科学的进步，许多自然科学的新发现和发明不胜枚举。细胞学、比较解剖学、生理学以及实验药理学、诊断学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起来。尤其是诊断学，叩诊法被推广和应用到临床上；由法国病理学家雷奈克（Laennec. R）发明的听诊器，现在仍被临床诊断疾病所用。另外，血压的测量、体温的测定开始应用，喉镜、胃镜等许多诊断疾病的仪器先后发明并应用于临床。可以说，西方医学迈入了现代科学的时代，特别是1840年以后，“医学之进展迅速，名人辈出”。^[23]如法国著名的自然科学家巴斯德培养了减弱炭疽杆菌毒力的疫苗，又用同样的方法研究出狂犬疫苗，并用此疫苗挽救第一个狂犬病儿童；德国医生科赫研究并发现了多种细菌，而且他毕生都在从事着细菌的研究，由此获得了1905年的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这一时期，在医学领域像巴斯德和科赫这样为现代医学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还有很多，在此不一一罗列。进入20世纪，科学技术空前的发展，相应的促进了医学的进步。西方医学在诸多领域取得长足进展，如肖丁（Schaudinn F.R）和霍夫曼（Hoffmann E）发现了梅毒螺旋体，而日本的野口英世则成功地完成梅毒螺旋体的人工培养，并用于治疗梅毒；X光及心电图的诊断技术被广泛应用于临床、维生素及营养的研究，使人类对维生素有了认识，弄清了各种营养素缺乏的病因，便于人们采取强化食物的措施来预防营养缺乏。另外，关于热病的研究、内分泌的认识、血型的发现及社会医学的提倡等都有了新进展。^[24]可以说西方医学在许多方面走在世界医学的前列，为基督教在非西方国家利用医学进行传教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二、新教传教士在山东传教行医的原因探析

宗教传播作为一种文化传播现象，一定要同传播对象的社会环境相适应。新教

传教士之所以利用医学在山东进行传教，适应山东社会是一个重要原因。

（一）山东落后的医疗卫生状况、疫情及流行性疾病对西医的需求

1、山东传统医学的落后

（1）巫医盛行

中国传统医学源远流长，有一套独特的理论体系，与所有医学一样，它的产生与巫医有密切的关系。中国医学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了佛教医学、道教乃至理学的影响^[25]，使得巫医在诊断疾病方面采用占卜的方法探明发病的原因。这决定了中国医学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缺陷，甚至掺杂有不少迷信因素。表现在社会上就是“巫医盛行”，在山东也同样如此。一些新教传教士在山东乡村传教中看到“风俗中有甚多迷信及有害身心的积习”，“医治疾病多靠古老的医术、巫医、迷信”，^[26]以至于许多人得了重病因得不到有效的医治而丧失生命。

（2）卫生状况落后

不可否认，中国人有自己的卫生观念和习惯，但整个“社会的卫生观念与卫生状况却是相当差的”，“入其市则砖砾横道，污水流泞，登其室则几案封尘，唾痰遍地……”。^[27]来华传教士对山东卫生状况也有同感。他们描写山东乡村的卫生状况说“医药非常缺乏，公共卫生习惯与设施几乎完全缺如，…多数人的健康不知卫生之道，疾病甚多”。^[28]也就是说生活环境的不卫生是疾病流行的重要原因之一。山东卫生状况的极端落后使传教士们意识到用现代医药为当地民众治病和培养现代医药人才的重要性，而且这项工作如果能做好，一定会有助于基督教的传播。

2、传统的医疗方法在疫情及流行性疾病频发面前束手无策

近代中国的中医理论虽然源远流长，“中国医生又有相当丰富的药物知识，能准确地描述疾病和疾病的发病过程，但他们缺乏对疾病的科学研究，缺乏对卫生、消毒措施和控制疾病之间关系的研究。”^[29]山东的情况也同出一辙。如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烟台，卫生状况极端落后，疫病连年猖獗流行。霍乱、鼠疫、天花、伤寒等烈性传染病严重危害着人民健康。中医除了应用中草药治疗外，对此毫无办法。而传教士医生初到烟台后，看到鼠疫、霍乱等疫病的频发使很多人死于非命，他们就发放药品，采取消毒隔离等措施，有效的抑制住大流行，使许多患者得救。^[30]也正是瘟疫的流传增加了西医的威望，传教士通过“施医舍药”来改变人们对西洋教会的看法，推进传教事业的发展。

（二）传教士自身的需要

对于一个到达新环境的人来说，他不仅要适应当地的文化环境，还要适应当地的生活环境。一些初到山东的传教士，在山东特殊的自然环境和卫生状况下，或者因为水土不服或者因环境恶劣而患病。在早期的传教历史中，传教士及其家庭成员的死亡率非常高。1862年，霍乱最猖獗的一年，烟台、登州两地共有三名传教士和眷属五人死亡。据在登州目击当时情况的一位传教士记述“当时这个好似垂死的小城，每天空中都充满了出丧哭号之声，真是触目惊心，他们初抵异域所受的打击显然可想而知”。^[31]虽然他们懂得一些医疗知识，但远远不能满足应付实际的需要。因此，建立医院、诊所，为传教士提供医疗保障体系迫在眉睫。

（三）开展妇女工作的必备条件

占人口半数的妇女在传教工作中十分重要，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传教工作的成败。医药事业对于打开在妇女中传教工作的局面，似乎更为重要。然而在“男女七岁不同席”、“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意识影响下，近代山东妇女不能像男人一般随意去教会医院就诊，也不愿让外国男性医生诊治，由此而延误治疗者所在多有。她们愿意让男性医生的妻子，或者任何一名西方妇女来医治。为了便于在山东妇女中开展医疗工作，各教会纷纷呼吁派遣女医生来山东工作。女传教医生来到山东后，经常在各种恶劣的天气下长途跋涉去照顾病人，甚至有时受到极其愚昧、缺乏人道的异教徒的阻拦，可见妇女从事医学工作难度之大，但是一旦做出成绩，则更有助于传教工作的开展。正如传教士们所说“这些具有献身精神的医护人员的伟大爱心和宝贵奉献，受到了上帝的祝福。上帝利用医学大施恩惠，以消除愚昧，令许多家庭感受其存在。”^[32]女传教士医生用她们的实际行动感化民众，有力的推动了传教工作的进行。如在山东的一个乡村，那里曾经没有一个基督教徒，但是在位女医生深夜冒着暴风雪出诊，救治了一位女病人之后，这个村庄的教会发展起来。实际上正是女医生的慈悲之举的影响，以至于用村民们的话说：“教人这样善行的教义，那是值得学习的。”^[33]

综上所述，新教传教士在山东所从事的医药事业，固然与基督教医学传教传统及西方医学的发展有关，但是对山东社会的适应则为它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之所以在山东产生医学传教士这一特殊群体，与很多人类家庭缺乏基督教和理性医学有关，同时教会发现医学传教对于那些处于穷困状态下的人是一种帮

助。而西方社会发展变化又为医学传教士的来华提供了支持。这一切最终导致了西方医学在山东的产生和发展。

三、 新教传教士在山东从事的医药活动

1835年11月4日，由美国公理会传教士伯驾主持的广州眼科医院正式开放，由此奠定了基督教在华医药事业的起点。伯驾也是第一个来华的有正式身份的传教士医生。欧美传教士踏上山东的土地后，先后在山东的登州、烟台、潍县、济宁、德州、青岛、滕县等地设立诊所、开办医院，把西方先进的医疗技术传入山东。当然，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并非是单纯的关心山东人民的身体健康，而是通过这些方式来推动传教工作的开展。关于这一点，美国基督教差会负责人司弼尔直言不讳的说“我们的慈善事业，应该以直接达到传播基督福音和开设教堂为目的”。^[34]因此，可以说新教传教士们是把医药事业“作为福音的婢女”来看待的，即利用医药工作扩大教会影响，推动宗教传播。纵观新教传教士在山东的医药事业，大致可划分以下几个阶段和类型。

（一）初创时期

山东新教的医疗活动开始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初创时期颇为艰难。^[35]1900年以前，教会在山东的医疗活动规模一般都很小，数量不多，通常都是附设在教堂里的诊疗所，即使是正式医院，收容能力也有限。

1862年夏，正值霍乱猖獗时期，已在宁波工作多年的美国北长老会的麦医生(Dr. D. B. McCartee)被派到烟台行医、传道。由于所住的地方较远，交通不方便，又与夫人返回宁波。麦医生走后，医务后继乏人。六年后，长老会又另派医生到烟台和登州，至少先后派了六名，但都属短期性质，来去匆匆，其中唯有尼勒医生服务时间较长。“除青岛外，在每处布道站，开展医疗工作，一直是美国北长老会山东差会的政策”。^[36]到1877年，长老会在山东的第一位女医生安德森加入济南布道站。1879年，医学博士亨特(Hunter)和夫人的到来加强了医务力量，由于健康原因，二人不久返回美国。1879年，长老会系统的第二位女医生克莱倩抵达登州教站，不久调往日本。^[37]

长老会在山东不能坚持行医的原因，一是传教士对这里的生活习惯、生活环境

不适应造成的；二是行医之初，“高级社会人士不敢前往就医”，得不到地方绅士的支持，只有一些贫苦家庭抱着“有病乱投医”的心理去宣教师医生那碰运气。^[38]直到1883年，聂会东夫妇来后，长老会在山东的医药事业才开始呈现比较稳定的状态。聂会东对后来的齐鲁大学医学院及整个山东近代的医学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

1870年，英国基督教浸礼会医生卜维廉(Winiam Brown)以医药传教士身份到了烟台，开办了一个小型医院，实施西医诊疗，并将一些基本英文医药书籍译成中文，他还收了四名中国人，故有人称他为“山东播下西医治病与西医教育种子的第一人”。^[39]此后，山东浸礼会的医务工作以青州和邹平为中心。1884年，在青州府兴建了一座新医院，由武成献任院长。当时有病床50张，医生20余人，护士和实习生14人；邹平的医院建于1900年。青州府和邹平两个医务中心平均诊治病人16000名。^[40]虽然这一时期从事医学布道的传教士很少有专门的医科出身，但大多数来华之前受过一定的医学训练。

英国圣道公会在山东的工作始于1860年，主要是在乐陵和朱家寨。1878年，斯坦霍斯医生(Stenhouse)在乐陵朱家寨建立医药布道会。该布道会“拥有一座设备良好的大型医院，内有男、女病人用的病房，这所医院后来由马绍尔(F. W. Marshall)医生接管，每年接诊病人约10000名”。^[41]

美国公理会总感到中国人中有许多疾病急需治疗，因此它强调治疗工作要同传教士的传教活动联合行动。公理会各布道站的医疗工作从1878年大饥荒之后开始，起初医药活动是在一所很小的房子进行。经过几年的发展，从1884年起，才一直开展持续不断的医院和诊所工作。1881到1901年两个十年的时间里，有案可查的门诊治疗人数，包括复诊病人在内，共计230000人，年度记录最高年份是1897年，治疗病人26000名。^[42]

美国美以美会于1897年在泰安创建博济医院(Priscilla Benneth Hospital)。该医院的女传教士医生除了诊治来自周围乡村的病人外，相当一部分病人是到泰安进香的香客。女传教医生还负责泰安城内寄宿女校的学生们的医疗检查。

此外，德国同善会于1901年为纪念已故花之安博士，在青岛创建华德医院。^[43]

德国信义会毕业于护士学校的卢维廉夫人于1901年在即墨设立一家小型医院，穆勒护士来华后加入该院医疗工作。^[44]因就医者众多，医院另建二层楼房一所，设置病床，收住院病人。

总之，这一阶段是教会医疗事业的初创时期，他们所从事的各种医疗活动，如创办医院、诊所等，大都是场地狭小、设备简陋。原因主要有三：其一，教会初期在医疗事业中的投资比较有限，像早期美国长老会的雅各医生在山东登州创建诊所时，由于教会在此项工作中所拨款项很少，因此，只能在寺庙中租房子开展工作。其二，这一时期医疗工作发展缓慢与当地民众对教会的态度是分不开的。当时山东省内广大农村以及州、府、省城三千万民众的看病吃药仍然依靠中医。人们大多相信切脉、汤丸灵验，一般不求助西医洋药。所以，就诊者出于对西医的陌生和对教会医生的敌视而不去寻求西医治病。其三，各差会之间缺乏合作，大多是独立工作，这对教会医药事业的开展十分不利。针对上述这种局面，医院和诊所一方面通过一些捐赠来维持医院的日常工作，比如：美以美会最初在泰安的医疗工作的开展，主要依靠天津、顺化、北京教会医院的朋友和个人提供的药品、毛巾、肥皂、绷带等援助；另一方面免费医治和施药。在许多小的教会医院中对教徒的费用，对极其贫苦的人还是给予照顾，以赢得民众的信任，教会医院还一直具有施医院的性质。如临清华美医院是公理会下属的慈善机构，该院对来就诊者都本着少收费或不收费的原则。部分确有困难的危重病人，也可部分或全部免交床位费、药费或伙食费，当时每年免费住院者约有六七百人。^[45]这样来医院就诊的人数逐步扩大，增强了山东民众对教会医院的信任度，西洋医院得以发展。欧美各个差会在山东一些地方还建起了一些重视空气流通和卫生条件较好的医院。到 1901 年，据统计就诊人数达到 108000 万人次。

表三 1901 年以前山东省教会医疗概况统计表

教会名称	举办医院	治疗人数
中国内地会	1	12000
美国长老会	6	6000
美国南浸信会	2	10000
兄弟会	1	5000
英浸礼会	2	16000
英国公理会	1	5000
美国公理会	2	12000
总计	15	108000

资料来源：据青岛市档案馆编：《帝国主义与胶海关》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96页统计

（二）发展时期

1901-1920年是教会医院大发展时期。据《中华归主》记载：“民初1920年间山东的教会医院比19世纪有很大的发展。”“本省医药事业中最负盛名者为齐鲁大学医科及济南共和医院，属英浸礼会、伦敦会、豫鄂信义会、加长老会、北长老会、南长老会、华北英圣公会及圣道公会合办。医科用汉语教学，于一定时期内经费取给于中国博医会。此外另有十二差会各自设立医药事业，九差会在三十个宣教师驻在地设有医院二十所。十差会设药房于各大医院设施地区。此数在全国各省中为数最多。本省二十八所，医院中有外国医生39人，中国医生49人，外国护士21人，毕业中国护士32人共同执行任务。而当时整个山东省仅有两所国立医院，一在济南，一在威海卫。”

这些教会医院是继1900年义和团运动之后在原来的基础上逐渐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在山东势力比较大的所属美国教会，以登州、烟台向交通枢纽潍县、济南、济宁、滕县迅速推进，建立济南华美医院、潍县基督教医院、济宁瑞德门医院、滕县华北医院；英属教会也在青州、周村、平阴、乐陵等地建立医院。另外在济南还有十三个教会合办的济南齐鲁大学附属医院。这些医院位于重要城市的毕竟不多，但它形成了从小医院到规模比较大的医院这样一个网络，主要分布在山东东部和中部，而势力比较弱薄弱的教会，医疗活动也同样薄弱，如山东中国内地会，由于该会的工作一直局限在烟台一个地方，所以只在烟台开办了一所隔离医院，收治传染病病人。各主要差会医院情况见表四：

表四 1901-1920年山东省基督教教会医务表

教会	美长老会	英圣公会	英浸礼会	美浸信会	公理会	美以美会	英圣道公会	内地会	共和医院	瑞典浸信会	总计
教会医院	11	2	2	4	2	3	1	1	1	1	28
住院人数	46980	2440	5440	12560	20980	3560	2200	4700	20060	700	119620

资料来源：据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中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429 页

从 1920 年至 1936 年，由于这一时期中国经历了“五四运动”、军阀混战等，受这些事件的影响，教会医院的数量没有增加，基本维持在 1920 年的基础上，但在医院规模和医疗设施上有了很大的发展，见表五：

表五 1936 年山东新教教会医院统计表

医院名称	创办者	院长	地点
齐鲁医院	协和	海贝殖	济南
德麟医院	中华基督教会	何德麟	济南
广的医院	英浸礼会	贝德儒	青州
怀阿医院	浸信会	于克谟	平度
鸿济医院	中华基督教会、浸礼会	王守礼	北镇
复育医院	中会基督教会	贝德儒	周村
怀麟医院	浸信会	安肅林	黄县
德门男女医院	长老会	司福束	济南
瑞门德男女医院	长老会	寇振志(代)	峰县
广仁医院	圣公会	吴治安	平阴
卫氏博济医院	公理会	齐载阳	德县
梅铁医院	浸信会	傅雅各	掖县
爱麟女医院	浸信会	钟爱义	掖县
毓璜顶医院	中华基督教会	狄塔	滕县
华北医院	长老会	于道荣	烟台
循道施医院	循道公会	德瑞芝	朱家寨
如己男女医院	循道公会	杜斐迪	武定
教会医院	长老会	丁怜悯	沂州
教会医院	长老会	丁怜悯	潍县
博济医院	美以美会	?	泰安
瑞华医院	浸信会	?	胶州

体仁医院	内地会	祝康宁	烟台
教会施医院	通圣会	?	南管陶
华美医院	公理会	孔美德	临清
广仁医院	圣公会	刘大夫	兖州

资料来源：中国教会研究中心、橄榄基金会联合出版：《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34-1936），第 488 页

上表所列医院多数为 1920 年前建成，后来不断发展，为改善山东医疗卫生状况起了重要作用。下面选取几个有代表性的医院，予以简单介绍。

1、烟台毓璜顶医院

1901 年由美籍牧师考尔特及其夫人在烟台毓璜顶开办了一个小药局，后来渐渐成为诊疗所，这就是毓璜顶医院的雏形。1906 年，回国休假的郭显德博士向刚从宾夕法尼亚州大学毕业的嵇尔思医生（Dr. Oscan F. Hills）讲述了在烟台“建立一家与烟台长老会有联系的医院非常必要”的想法。^[46]1908 年，嵇尔思夫妇被派到烟台从事医疗工作。在学习汉语期间，嵇尔思医生在训练有素的护士郭显德夫人的协助下，开始在烟台筹建毓璜顶医院。历时三年，于 1913 年建成了一座拥有门诊楼、病房楼、护士宿舍楼的医院。1914 年，该院正式营业，嵇尔思为院长。这座医院得到了美国宗教界、卫生界和大财团的支持，也得到了烟台各界人士的重视。当时，称其为“仅次于齐鲁大学附属医院的一座现代化医院”。据统计，从 1914-1924 年，门诊 47589 人次，住院病人 5189 人次，作各种手术 5221 人次。^[47]

2、临清华美医院

华美医院前身是“施医院”，义和团运动时，教会及“施医院”被焚毁。1901 年，重建，因华方捐款，美国人所建，故命名“华美医院”。它是美国基督教公理会下设的一个慈善机构，每年医疗费都由教会拨款。所以，该医院对前来就医而交不出就诊费的，由院长或医师在处方上签上“免”字可免费门诊，免费取药。^[48]华美医院自建院以来，得到民国政府、教会人员、医务人员、各界人士的赞助，医院购置了 X 光透视机，由于借助先进的仪器诊断一些疑难疾病，其门诊量和住院人数逐渐增多，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病人的疾苦，给当地人民的健康提供了保障。

3、黄县怀麟医院

1902 年由美国南浸信会教徒艾体伟医生在黄县县城小栾家村建立。医院有两层

楼房3幢，附属楼房2幢以及平房10余间。医院设门诊部、候诊室、住院处、药房、男院病房、女院病房、透视室等。设床位100张，职工近100名，医疗技术水平较高。1928年前后“因时局扰乱，医院分外忙碌，黄县怀麟医院则尤甚，一张、刘二军争夺地盘，张军败绩，受伤兵士前后如院者，数百计，今随就医者倍增。”^[49]怀麟医院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治伤病员，对胶东人民的抗日战争给予了帮助。

4、潍县基督教医院

1881年美国长老会派遣牧师狄乐播(Robert M. Matter)来潍县传教，在潍县建教堂、学校、诊所，取名“乐道院”。1900年义和团运动波及潍县“乐道院”，外籍人员全部逃亡青岛。当地义和团烧了“乐道院”，清政府与各国列强签订了《辛丑条约》向列强赔款。1902年，美国长老会利用清政府赔款，在原地增购土地重建“乐道院”，并扩大了规模。1904年建成，将诊所扩大为医院，取名“美国长老会医院”(America Presbyterian Hospital)。医院设置病房，实行男女分院，分别收治男女病人。医院为了显示“上帝”的仁慈，除看病外还施药、施饭，所以到医院看病的人日越来越多。1913年美国外科医生海姆博格(L. F. Heimbarger)到医院工作，并任院长，使医院的医疗技术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1925年，由美籍医生梅仁德(E. E. Mrrady)筹资扩建的医院建成，并改名为“潍县基督教医院”，由潍县名医张执符任医院院长。此时，医院共设病床72张，分为内科、妇产科、小儿科、外科，还设有手术施、X光室、化验室，职员80余人，门诊量1928年时每天达到40-50人次。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乐道院”。

5、齐鲁医院

自聂会东来济南传教筹办医学堂及医院后，1906年英国基督教浸礼会也派武成献(Wafson)、巴德顺(Paterson)来济南，并将他们在青州创办的医学机构迁来，与聂会东办的医学堂合开为“共和道医堂”。起初规模很小，到1907年建立“济南共和道医院”，作为共和道医堂的实习医院。1911年，“共和道医堂”正式改名为“山东基督教共和大学医科”，并又建了一幢病房楼。1917年“山东基督教共和大学”改称“齐鲁大学”，该医院亦改为“齐鲁医院”。当时，该医院有病床105张，后增加到120张。临床各科俱全，设备先进，由于齐鲁医院由“美国罗氏驻华基金会的资助，英美十余个教会团体的捐赠”，因此财力雄厚，技术力量过硬，从其门诊人数及住院人数可见一斑。

表六 1929-1933年病员统计表

年代	门诊人数	住院人数
1929	4700	1250
1930	60000	1400
1931	70000	1450
1932	75000	2100
1933	80000	2200

资料来源：《私立齐大医院》齐鲁大学档案 9-3-52 第 69 页

6、滕县华北医院

基督教北长老会于 1913 年在县城建“福音医院”，^[50]这是滕县最早的西医医院。医院由美籍女牧师道德贞兼管，设病床十张。1931 年，教会投资建门诊楼十余间，设置内科、外科、妇产科、X 光室、手术室等，病床增至 20 张，医疗人员 18 人。1935 年，为了适应当地病人看病的需要，又进行了扩建，在建筑面积、医疗仪器、病床设备上大加改进。此时，来该院就诊的病人大增，治疗范围除滕县外，还有邹县、费县、峄县等临县病人，“就诊者络绎不绝，为基督教华北医院的昌盛时期”。^[51]

纵观这一时期的教会医院大致呈现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医院规模扩大，设施良好。如烟台毓璜顶医院拥有 U 字形住院大楼及门诊大楼各一座，病房数十张。潍县基督教医院“1925 年建一幢呈十字架形西式楼房，楼高四层，建筑面积 2416 平方米，为潍县当时最高建筑”。“齐大医院，院中全部有电器设备，有中央系统的暖气设备，有自己供应的冷暖自来水设备。”二是医院的设备呈现现代化。“齐鲁大学医院有 X 光室，新装置先进 X 光线机一架，为当时国内最好的 X 线机之一。”^[52]而当时在山东的大部分的教会医院，都有开展骨化、普外、痔疮等手术的必备器械。三是医疗水平大大提高。许多教会医院能做较复杂的手术。潍县基督教医院“到 1918 年医院已能做白内障摘除术、全眼球摘除术、碎胎术、胸骨切除术、乳腺癌切除术、食道狭窄扩张术等。”^[53]

（三）建立麻风病院

教会医院在治疗麻风病、精神病等特殊疾病上处于领先地位。麻疯病是一种较难治疗的传染性皮肤病，有文章说“天下之最痛苦者，莫如疾病，疾病之最惨恶者

莫如麻风，一罹其毒，终身不治。”^[54]。在近代的山东，这种病的发病率非常高，麻风病人被置之不理，受人歧视。而中医对麻风病的治疗收效甚微。随着教会医院的发展，医学传教士积极进行麻风病人的治疗，把西方社会防止传染病的方法用于山东，陆续在山东建立起麻风病院。山东麻风病院建立情况见表七：

表七 山东麻风病院建立情况

名称	地点	时间	设立机关	收容量数
滕县麻风病院	滕县	1918	美国长老会	100名
济南麻风病院	济南	1926	英国麻风病救济会	50名
青州麻风病院	青州	1936	不详	不详
兖州麻风病院	兖州	1928	不详	不详
潍县麻风病诊所	潍县	不详	美国长老会	50名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教会研究中心、橄榄基金会联合出版：《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34-1936）邱志坚《麻风病院》和刘天路、陶飞亚：《基督教与近代山东社会》，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19页统计

上述医院中，在山东最早建立的是滕县麻风病院。它是由美国长老会女传教士道德贞女士，1913年建“华北基督教医院”后，于1917年因“悯滕人患麻风病者众，欲筑医院”，在得到乡绅的赞助后，“1918年春由道女士一手操持兴建，同年春竣工”。^[55]“该医院建筑面积1502平方米，办院经费由英伦敦万国麻风救济会和加拿大麻风救济会定期供给”。^[56]道德贞为处境悲惨的麻风病人提供了获得救助的机会。但是，从事这类疾病的医务人员还是很少，像滕县麻风病院，也只有三名外籍医务人员。在教会医疗界的推动下，麻风病问题引起了社会上的注意。1926年齐鲁大学附属医院也创办了麻风病院。由于其每年经费由地方政府、教会团体、社会人士及万国麻风病救济会捐助，医疗条件比较好，技术力量相对其它麻风病院要高一些，故收治病人较多。“据1926年到1932年的报告，住院病人169人，出院病人115人，其中治愈者60人，显著进步者37人，效果不明显者仅16人。”^[57]

四、教会办的西医教育机构

山东医学教育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战国以降，古代山东医学教育的内容皆为传授中医药学，形式上基本是祖传、师承、自学。^[50]其中，祖传囿于家族内部，且多有传子不传女的陋习；师承多系亲友带徒，传授范围也是有限；自学则一般是仕途失意的儒者自学成才。这三种形式至今仍可见。但历史的脚步踏入了近代社会，医学教育在内容、形式、规模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传教士大规模进入山东后，在山东开办了教会医院、诊所，作为辅助传教的重要依托。正是这些教会医院、诊所，萌生后来的近代山东西医教育，从而为近代山东医学教育领域注入了引人注目的新内容。从 19 世纪末起，一些医学传教士主张进行正规的医学教育，20 世纪初医学传教士对医学教育更加注重。这主要是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其一，义和团运动期间，许多地方的医学传教士撤离，如邹平的施医院，义和团运动爆发时，传教士医生都逃跑了，当地没有胜任的中国医生，医院不得不关闭，1902 年传教士又回来将医院修整开张。而临清的医疗工作也是由于那里的医生在 1900 年返回美国而停顿下来。在这种情况下，传教士们“可以找到中国基督教牧师和教师继续为教堂和学校工作，但却无法找到足够的受过现代医学训练的中国医生来继续开办医院。当传教士重新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时，他们已认识到创办好的医科学校以培养能够胜任工作的中国医生（而不是助手），是十分必要的。”^[51]其二，到 20 世纪初，山东省只要有基督教会的县城和城市，就有教会医院或诊所，在这些医院或诊所里，每年都有成千上万名病人得到治疗。传教士医生在对当地民众治疗疾病的过程中，他们以精湛的医术博得了信任。到教会医院里求医的人不断增多，而教会医院没有足够的医生、药剂师和护士。像美国公理会在庞庄建立的医院只有三名医生，而他们最多一年要治疗病人 26000 人，平均每天要接诊 70 人。鉴于以上的情况，许多医学传教士主张发展医学教育以弥补人手的不足。

（一）早期医学教育

西医教育是医学传播中极为重要的途径，影响深远。开始时，传教士并没有想到要开展医学教育，他们仅仅是为了医疗上的需要，在医院和诊所招收一、二名生徒，授以浅近的医学知识，目的是训练他们担任护理工作或传教士。但是，用这样

的办法培养出来的人数极少，远远满足不了医疗上的需要。比如，英国浸礼会医生卜维廉在烟台开办医院时，它收了四名中国人当学徒，教他们西洋医学知识；美国北长老会的聂会东夫妇在登州行医时，招收了五名学生，采用自己编译的教材，传授西方医学知识；浸礼会的传教士武成献在青州的医院附设一所医学堂。另外，巴德顺在邹平、章嘉理在临沂也创办了医学堂。然而这种学徒式的训练方法受种种局限成效不高。掌握西医，必须从基本原理和基础知识着手，因而只有创建学校，才能使西医知识的传授正规化、系统化，才能培养出全面了解和掌握西医的人才。所以医校的建立势在必行。

1891年，聂会东夫妇奉调济南后，在济南建立了“华美医校”，当年招生5名。1900年以后，医学教育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1902年时华美医校已有在校学生22人。全部为男性。^[60]

妇女医学教育也在这一时期开展起来。1889年，长老会的两位女医生玛丽·布朗（Mary Brown）和狄克森（Madge Dickson），在潍坊进行培训女医护人员的尝试，至此开始了近代山东妇女的医学教育。尽管这次试验为期很短，但成效不少，有3位毕业生成功地开业行医，成为近代山东第一批掌握了现代医学知识的本土女医生。^[61]

这些早期的医学校或培训班开办的初期只是出于实际的需要，因而在办学规模、师资力量和招生数量上都显得比较薄弱，医学校也没有完全脱离学徒性质，但它开创了山东医学教育的先河，为山东教会开展正规的医学教育奠定了基础。

（二）教会正规医学教育的开展

1、背景

（1）学徒式的训练毕竟不是正规的医药教育

医学传教士们意识到这种学徒式的训练不是长久之计，要有效的帮助山东发展现代医药卫生，医治广大山东民众的疾病，必须大量的培养合格的本土医生、药剂师及护士等，要有效的发展这项工作，就必须设立医学校，而后办理高级或大学的医学院。截至1901年，山东的一些县城与城市设立的医院已达15所，对医生、药剂师与护士的需求日益迫切，建立一个大学程度的医学院提到了传教士们的议事日程。

（2）官办教育的刺激

19世纪20世纪之交，迫于社会进步的趋势，清政府不得不推行一定程度的改革，

倡导“新政”，这对山东医学教育局面有所触动。1901年，山东巡抚袁世凯宴请数名文会馆师生协助，在济南创办了全国有名的省级官办大学堂————山东大学堂。大堂设预科、正科。学生自预科起分三类编班，其中的第三类便是有志于高等医学教育的学生。1906年，官办的济南中西医院附设讲堂和医学堂，分别讲授西医、中医知识。1909年，山东官府决定培养法医（检验吏），将中西医院的讲堂、医学堂合并，改为转授西医的检习所。山东官办医学教育的推行，动摇了教会医学一统山东的局面。新教传教士们认识到必须建立正规的西医教育机构来与山东官府的医学教育相抗衡，才能继续借助医学传教在山东的土地上发展教会实力。

（3）中国若干事件的影响

一是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在华北各省，很多欧美宣教士被杀害。他们建立的一些教育与医药事业遭到破坏；二是清政府容许爱国人士提倡维新，又下令废除科举制，以现代经济、技术等选拔人才，这样就激起了有识之人学习西洋科学的兴趣。这些事件使英美传教士们深感单纯传教和开办医院并不能改变中国人民，唯有教育才是至高无上的；唯有在事业上互相合作，有充实的人力和财力，才能在中国创办规模大、功效大的事业。因而它们改变在华策略，视大学教育为主要目标，决定走上联合办学的道路。齐鲁大学医学院就是这种情况下的产物。

2、齐鲁大学医学院

1902年，英国浸礼会和美国北长老会决定合办“山东基督教共和大学”。这所大学分为文理科、神科和医科，各科分在省内不同地区，其中，分处济南、青州、邹平、临沂四地的四所教会医学堂合并为共和医道学堂，由聂会东担任校长，算作大学的医科。共和医道学堂起初并无固定地址，其四个年级的学生于1906年集合到济南，而后按时巡回到济南、青州、邹平、临沂的教会医院上课实习。后经多方努力，共和医道学堂的医学大讲堂和诊所大楼于1911年在济南竣工使用。从此，共和医道学堂拥有了固定的地址和设备齐全的教学医院，教学环境大为改善。民国建立，山东的社会环境为之一变。“革命和共和国建立的显著影响之一，就是对基督教，对外国人，特别是传教士持开放态度的人大大增加了”。^[62]这为教会势力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教会尤其是基督教教会的教育、医疗机构在民国前期有了迅猛发展。同时，在新的社会氛围中，追求西方新知识逐渐成为社会时尚，人们对西医洋药等舶来品也越来越乐于接受。在西医大兴其道的时代，定址济南的共和医道学堂以良好的办

学条件赢得各方瞩目，办学规模日益扩大。后得到“美国罗瓦基金（Rockefeller Foundation）”资助 1.5 万美元，作为其扩充校舍、购买仪器，增聘教师之用。^[63]1917 年，齐鲁大学在济南正式建校，共和医道学堂成为齐鲁大学的医科，聂会东任首任医科科长。同年，在中国博医会的安排下，两所教会医学院校——南京金陵大学医科（美国基督教会在华宣教士创办）和汉口大同医校（由英国基督教伦敦国外宣道会和美以美会在华宣教士合办）的 20 多名师生先后到济南，并入齐鲁大学医科。^[64]他们带来一些优秀的医学教授，如：施尔德（Dr. Randolpt T. Shields）、名多吉玛（Thomas Gillison）等，使齐鲁大学医科急需充实、完善。1920 年，增设了药学专修科。1924 年，又一所教会医学院校——华北女子协和医校的全部师生，自北京南下，并入齐鲁大学医科。华北女子协和医校的并入，不仅进一步增强了齐鲁大学医科的实力，而且有力地推动了齐鲁大学男女同校的风气。齐鲁大学医科于 1925 年提出报告：“实践证明，男女同校学习医学是完全切实可行的，我们并没有遇到任何重大而又不可克服的困难”。^[65]

20 世纪 20、30 年代是齐鲁大学的发展时期。其医科毕业生还可被授予加拿大医学博士学位。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承认齐大毕业生的学历，允许其免试入研究院学习。从整体来看，齐鲁大学的医学教学教育水平在全国范围内名列前茅。30 年代，国内医学界有“南湘雅，北齐鲁”的称誉。齐鲁大学自认经过“不断的发展，在中国境内，虽不敢说是首屈一指的，总算是第一流的医学院了”。^[66]齐鲁大学医学院之所以能名列当时中国医学教育前茅，主要原因在于：（一）较充裕的经费。医学是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发展医学教育需要比较充裕的资金、仪器、图书资料等物质条件。在近代国疲民穷、社会动荡的情况下，山东乃至全国大多数公、私立学校都难以得到稳定、充裕的物质保障，而齐鲁大学作为多个差会合办的教会大学，能多得到稳定的经费和多方的资助。不仅有各差会母会定期拨款，山东地方政府也时有捐款。如：齐鲁大学建校时“山东巡抚孙宝琦到校发表演说并且捐款；政府连续几年每年赠款给学校。”^[67]（二）是精良的师资队伍是教育质量的可靠保证。在 20、30 年代，任教于齐鲁大学医学院的教师主要是由各差会从国外派过来的。他们一般都在本国接受过良好的医学高等教育，有的在其本国便具有相当声望。这支师资队伍的业务水平不仅得到了中国医学界的首肯，在国际上也有一定声誉。美国医学界组织撰写的《西氏内科学》是部权威性很强的医学经典之作。该书的执笔者皆为国际上著名

的专家学者，其中“有三位作者是齐大医学院的教授，内科的执笔者 Dr. Smily 和黑热病的执笔者 Dr. Struthers 一直是齐大医学院的教授，妇产科的执笔者 Dr. Gorden King 原在北平协和医学院任教，后到齐鲁大学医学院执教”。^[68]（三）是齐鲁大学长期保持着严谨的学风和浓厚的学习氛围。学校对学生严格选拔，严格训练。经过七年苦读从医学院毕业是很不容易的。当时每年也就几十个毕业生，有时只有三、四人毕业，治学严谨可见一斑。基于此，齐大医学院毕业生中涌现了相当数量的医学名家。

表八： 历年毕业人数统计表

1932	1933	1934	1935	1936
20	28	14	20	17

资料来源：杨懋春：《齐鲁大学校史》载于（台湾）《山东文献》山东文献社出版，第十卷 第一期，第 81 页。

（三） 护士教育

山东近代护理是伴随着西医和宗教的传入开始的。传教士们初到山东开办医院、诊所，没有独立的护理专业和护理人员，只是招收一、二名学徒，训练他们担任护理工作，而且常常是采用男性，或者是由传教士夫人担任护理工作。另外，受当时社会风气和古老传统的影响，人们不能接受青年女子作护理工作。然而，1900 年之后，教会在中国迅速发展，山东的教会医院数量大大增加，人们逐渐信任西洋医学，前来医院就诊的越来越多，护士在数量上远远满足不了教会医院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教会医院开始着手大量培训中国护士。为山东创立了最早的专业护士教育，培养了山东第一批专职中国护士。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烟台毓璜顶医院护士学校和齐鲁大学附属医院的护士训练学校。

1、烟台毓璜顶医院护士学校

这是全省最早的一所护校。1914 年 6 月，烟台毓璜顶医院开办了一所护士学校，招有 11 名男学生，计划在 8 年内完成学业。1918 年该校在中国护士协会注册后，毕业生可领到由中国护士协会颁发的文凭。学生在学校的学习“包括紧张的课堂教学和监督指导下的病房、手术室、食堂及门诊部的实际训练。护理服务不分昼夜。”^[69]护士学校在 1926 年申请为护士协会正式会员，从那时的第一届毕业班算起到 1936 年共 65 名领到了护校和中国护士协会颁发的文凭。

表九： 历届毕业人数统计表

年代	1926	1926	1928	1929	1930	1931	1932	1933	1934	1935	1936
男	4	1	1	2	3	5	3	4	2	1	2
女		4	1	1	2	3	2	7	5	5	7

资料来源：根据曲拯民：《烟台毓璜顶医院与护士学校》，《烟台文史资料》第八辑统计

从表中可看出其历年毕业生人数极少，这是由于毓璜顶护士学校“以德性、素质、学程、训练工作——”，重视质量不重数量，其毕业的学生仅占全国毕业生的七十分之一。“但是本护校毕业生，不拘服务本省农村，或在华北各地任何医院工作，她(他)们的学识、修养、技术与责任心受到称赞，有口皆碑。”^[70]

2、齐鲁医学院护士学校

1915年，齐鲁大学医学院建成一座现代化医院。但其护理水平远远不能满足专业护理服务的要求。“那时，病人的饮食起居，多有亲戚朋友料理，由于他们既不懂卫生也没有营养知识，看护情况远非令人满意。”^[71]因此，英国基督教浸礼会派遣毕业于格拉斯哥皇家医家的劳根小姐(Margaret Logon)到医学院附属医院训练中国护士。在一位中国医生的大力协助下，劳根小姐一边向各个教会学校发放招收护士的通知，一边向人们解释“在西洋各国，做护士很受人尊重，有高级社会地位，生活也有保障。”^[72]经过多方努力，选中12名高中毕业的学生，且都是基督教徒。在头一个月中，学生们不上课，被派到医院昼夜照顾病人。“这样做的目的是考验这些候选人，看看他们是否容易泄气。但到月底只有一个人退出去，这空缺很快被填补了。”^[73]

护士训练学校正式成立于1915年。开始时，有学生12个人，到1924年时，增加到四十人。这期间不只是招收女性，由于受中国社会风气的影响，还不习惯派女性护士到男人病房中照顾男病人，所以，学校也招收一些中学毕业的男生。学校将学制定为四年，使用1909年成立的中国护士协会所规定的教材。

随着现代医学和西式医院传入山东，护士职业不可避免地随之而来。由于这项工作在中国是前所未有的，所以一开始不但大多数民众瞧不起这种“侍候人”的工作，就连护士学校的学生也常常抱怨工作的艰苦，而且常常面临不被承认这是一种劳动职业的局面。然而“随着正规医学院的建立，医院教学如果没有护士专业似乎

不可能达到令人满意的医学标准。因此，在 20 世纪，许多教会医学院增设了护士专业，并力图使护士成为一门值得专门训练而令人尊敬的职业。”^[74]

五、山东教会医药活动的特征分析

近代中国社会风云变幻、战争频仍，许多事业的发展无疑都受到这一时代氛围的影响。教会医药活动作为一种特殊的医疗事业，虽受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但毕竟需要一个相对安定的发展环境。近代中国社会的动荡和民族主义运动给它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教会医药活动又与西方国家有密切的联系，西方社会发起的战争、经济危机或新思潮都对其有较大的影响。这一切使教会医疗事业的发展经常出现波折。山东教会医疗活动也不例外。除这个一般性的特点外，山东医药活动还表现出发展上的不均衡性。

（一）区域分布上的不均衡性

教会在山东的医药活动几乎是与西方势力侵入山东社会的进程同步的，这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在空间上的分布。1900 年之前，教会医药活动主要集中在山东东部地区，如烟台、登州、黄县、潍县、青州等地；另外，在山东北部乐陵、德州地区，由于受天津布道区教会的影响，在此也有医院、诊所设立。在山东省的其它地区只有零星分布。1900 年以后，中国社会进一步开放，而山东民众对西医日渐信任，到教会医院里求医的人不断增多，因此山东各差会雄心勃勃的推进他们的教会医疗事业，从山东东部地区逐渐扩大到中部地区。到 1920 年，全省设教会医院 28 所，“另有药房三十八处，分设于省内各地。”^[75] 医院所在地的数量统计就清楚地展示了这一点。

表十. 1920 年教会在山东创办医院分布表

烟 台	登 州	黄 县	莱 州	平 度	胶 州	潍 县	青 州	周 村	泰 安	兗 州	济 宁	平 阳	济 南	临 清	德 州	朱 家 寨	滕 县	峰 县	沂 州 府
2	1	1	1	1	1	1	1	1	2	2	2	1	3	2	1	1	1	1	2

资料来源：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中册）蔡永春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428 页十一图统计

从表中可见，全省有 20 处地方设教会医院，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及胶济铁路沿线、山东中西部地区；而北部及西南部地区只有六地有教会医院。不过教会医院相对少的地区一般均拥有多处药房。另外，由于教会医学教育一般都是由教会医院发展而来，护士学校往往是附设于教会医院。所以，教会医院的分布状况基本上决定了以上二者的发展情况。也就是说，他们同教会医院一样主要集中在教会医院发展规模比较大的地区。如烟台、济南、潍坊教会医院的规模和水平决定了这几个地区的医学教育及医疗水平都高于山东其它地区。

1920-1936 年间，教会医院虽然得到各差会的重视，但是医院分布状况并无太大改变，据《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34-1936）统计，1936 年，山东省有 25 所教会医院，医院所在地同 1920 年时变化不大，只是医院规模、设施等方面有所发展。

山东教会医药活动区域分布呈现出的不均衡性还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有关。首先，沿海地区是传教最先进行的地方，有较好的基础。同时大城市及沿海地区交通通信便利，可以优先接触到新的科学知识。此外，沿海城市及大城市生活条件比较优越，对医学传教士和教会医学院校毕业生有很大的吸引力。其次，1919 年以后，各差会面临经济问题和社会动荡等环境，加上后来发展高水平医院的限制，因此它们很难在山东建立更多的教会医疗机构。

（二）教会医药活动在山东各差会间发展分布的不均衡性

这与差会对教会医疗事业的重视程度很有关系。最早真正在山东开始西医治病和医学教育的是英国基督教浸礼会，在 1870 年他派传教士医生来烟台开始建诊所，从事医药活动。但是由于其传教医生与他的母会发生某种误会，在 1874 年即停止工作离开山东。1875 年英浸礼会的另一位传教士李提摩太经过在山东多个地方的考察，决定以青州为中心开展工作。而后浸礼会的医药活动主要集中在青州和邹平。而美国长老会一到山东，就积极开展医药活动，虽然很多传教士医生属短期性质，但由于长老会对山东传教工作的重视和支持，他们在山东的医学传教工作一直持续不断，先后在全省一些地区开诊所、建医院。这促成了美国长老会在山东的医药事业始终好于其它差会。事实上决定各差会教会医疗事业的发展关键是其实力，教会医药活动是一种花费极高的事业，各差会只有在资金和人力充足的情况下，才能充分发展医疗事业。相对来说实力强大的差会的医疗事业也比较发达。各差会教会医院发展的一些数据可以清楚的表明这一点。

表十一 1920年欧美主要差会在山东医药活动统计

宣教会	医 院	药 房	男 病 床	女 病 床	每年住院总 数	护士学校	毕业护 士
美国北长老 会	11	6	221	83	2349	4	44
美浸信会	4	3	87	43	628	1	8
美以美会	3	1	28	18	178	无	无
英浸礼会	2	2	56	40	272	无	无
公理会	2	10	90	60	1049	2	22
圣道公会	1	无	40	12	110	无	无
内地会	1	无	25	6	235	无	无

资料来源：根据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中册）蔡永春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429页表格统计

从表中可看出，美国北长老会设医院、病床及治疗病人最多。其次，公理会、美浸信会在这方面的发展要好于其它差会。大多数小差会来说，无法与他们相比。此外，医疗事业发达的差会往往都是英美差会，因为英美差会在国内能获得大量的捐助和支持。

（三）教会医药活动各部分发展的不均衡性

就教会医药活动本身而言，它各部分的发展也存在不均衡现象。教会医院明显地最受重视，它发展最早，数量也最多。其次受到重视的是护士教育，虽然它的起始落后于医学教育，但是数量却超过医学教育。再次是医学教育，它起始于19世纪70年代末，它的数量虽然少，但是影响较大。至于医学翻译、医学研究起始很早，但是从事者甚少，许多差会根本不予以重视，只有齐鲁大学医学院设有一处编译馆。编译馆在山东工作20多年，通过翻译，把医学知识介绍到中国，先后编译出“希氏内科学”、“史氏病理学”、“孔氏实地解剖学”、“格氏系统解剖学”、“秦氏细菌学”、“罗卡两氏外科学”、“贺氏疗学”、“梅氏眼科学”、“妇科学”、“耳科学”、“生理学”、“组织胚胎学”、“药物详要”、“外科小手术”、“高氏医学辞汇”、“按摩疗法”等并完全根据自己搜集的材料编写的“病理组织学”，并按期出版中华医学杂志。所有出版的各种书籍杂志，对于热心研究医学而又不能直接阅读外文者，当时确实起了传

播医学知识的作用。^[76]民国初年正式发展起来的公共卫生教育，虽然得到了一些差会的重视，但是许多教会医院因经济和人的限制，从事此项活动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齐鲁大学医学院的公共卫生系成立于一九三四年，但没有教学任务，只是从事医学防疫和救灾工作。先后发展起来的教会医疗事业的各部分被重视的程度各异，其发展程度自然也不均衡。这种不均衡性的出现，主要是由各差会、医学传教界的态度以及它们的实力所决定的。

六、西方传教士的医药活动对于近代山东社会的影响

（一）局限性

教会的“慈善”事业，包括医院、育婴堂、社会救济等，是以“直接传播基督福音和开设教堂为目的。”教会医院开办初期尤其如此，当时的一些教会医院像滕县的麻风院“凡入院病人，一般都要入教，病人入教后先学习教会问答，学读圣经，唱宗教歌曲。每日有晨更、大礼拜、背经会，统一行动。”^[77]齐鲁大学附属医院的布道办法也是非常严密，“每个病房都有半小时的日常布道活动——许多病人被基督教的呼唤吸引住了，在离开医院时宣称自己是基督的信从者——”^[78]这种传播宗教的结果，使许多病人变成基督教徒。从教会本身的目的而言，在山东发展医药事业开始时是以医疗作为传教的手段，借以发展基督教实力，就更广泛的背景而言，是拓展西方在中国的影响。

但是，“随着医学知识传授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开始具有半独立的性质，传教医师感到应将西医学作为一门完整的科学，在中国传播。另一方面，专职医生陆续来到中国参与到西医传授的行列，冲淡了传播活动中的宗教色彩。”^[79]所以，在山东的医学传教士把发展山东医药事业作为一种重要的事业来做。从教会在山东建立第一家医疗诊所起，到1920年，平均每年有四百名外国医护人员在这些医院工作。就西方各差会在山东所从事的医药活动来看，虽然有行医和布道密不可分的局限性，但它带给山东社会积极的、进步的一面还是主要的。

（二）积极影响

1、将近代医院制度和医学教育制度传入了山东

西医是完全不同于中医的，这不仅表现在医学体系上，而且表现在相关制度上，

如医院制度、医学教育制度等。传教士们所从事的医药活动为近代山东带来了近代医院制度和医学教育制度。有些教会医院在建立之初虽不完备，但大多经过发展后都逐步完备起来。它们一般都设有候诊室、门诊、病房等，并有相应的医疗设施；实行病人登记制度；实行新的护理制度等。20 世纪以后，许多教会医院还根据西方医院的新发展进行调整。值得注意的是，医院制度在传入山东时，并非完全是西方医院制度的移植。它为适应山东社会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如有的教会医院分男院部、女院部，后来又有女医院的设立；护士制度的实行上还实行男、女护士分别护理男、女病人的情况。

医学传教士在行医时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缺乏助手，为解决这一问题，他们在行医与行医之外还培养学生，开启了近代山东的西医教育。起初的西医教育是在教会医院里进行的。不少医学传教士招收生徒，一边行医，一边传授医学知识。这种方法从表面上看类似中国传统的生徒传授，但就其教授内容看，已是近代西医的教育范畴。医学传教士除传授给学生医疗技术外，还教给学生一些近代西方生理学和医学知识，并结合医疗实践进行教学。在这种生徒传授的基础上，医学传教士创办了一系列的正式医学校，后来还发展到高等医学教育（如：齐鲁大学医学院），由此开创了近代山东的西医教育制度。教会医学院校大都是对西方先进医学教育制度的模仿，它们对知识传授和实践并重，教学、考试都很严格。它们的教育模式对近代山东医学教育制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与此同时，医学传教士在培养护士的过程中将西方兴起不久的护士教育制度传入山东。在山东建立一些护士训练学校，烟台毓璜顶护士训练学校和齐鲁大学护士训练学校即是其典型。

2、引入西医西药，培养医界优秀人才，为山东医疗卫生发展提供了支持

医学传教士在行医之时为山东的民众带来了近代西方的医疗技术。19 世纪，西方医学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而得到迅速发展，先后来山东的医学传教士将西方最新的医学技术传入山东。他们不仅给山东人带来了新的药物，而且带来了新的诊断器材、诊断方法。同时，他们传入了西方的内科、外科、妇科等方面的技术。西医技术的传入在近代山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西方医学技术通过医学传教士的医疗快速传入山东，可以说医学传教士是传播西方医学科技的一座重要桥梁。同时，他们为山东训练出大批西医大夫和护士。从 1901 年到 1920 年，在山东的教会医院，共设病床 986 个，收治住院病人 119600 多人次，^[60]为山东民众的医疗保健做出了一

定贡献。在培养医护人员上，齐鲁大学医学院造就了大批的医学人才，像韩立民、郎国珍、张汇泉即是其中杰出的代表。韩立民(号忠信)：山东潍县人，毕业于一九一九年，是我国创立公共卫生事业的先进人物之一。几十年来，一贯致力于公共卫生事业，颇著声名及成绩。郎国珍教授：毕业于一九二五年，曾留学美国，专长耳鼻喉科，手术高明，著名一时。张汇泉(号剑涛)教授：毕业于一九二六年，在校学习期间，即为全班的优秀。后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专门研究组织及胚胎学。历任齐大医学院院长，浙江大学医学院院长等职。桃李遍全国，尤其对胚胎学具有独到之处。^[81]

上述三人为代表的传教士医学院校培养的医学人才以业务扎实、朴实肯干著称，为山东的医疗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3、“华尊夷卑”传统观念发生变化

近代西医以其外科等方面的长处在治疗某些疾病上十分奏效。一些中医屡治无效的病症，如眼病、皮肤病、肿瘤等，在医学传教士那里都可以妙手回春，强烈的反差使山东人民看到西医有高出中医的长处。教会医院和诊所起初都实行免费施诊，很容易吸引当地民众前往就治。因此，教会医院在一地设立后不久，就有大量的山东民众前往求治。不过，起初到教会医院和诊所去的主要是下层社会的人。如果说下层社会的中国人较少受儒家礼仪规范制约的话，那么一些官绅向医学传教士求治，则充分说明中国人在文化优越感方面的改变。官绅是文化优越主义的化身，他们对于外来文化最为反对。但是在反对西方文化的时候，他们却较早地认识到了西医的长处。早在传教士医生在山东开办医院之初，一些高级人士及官宦碍于身份和地位不能像一般人那样到医院就诊，但是随着医院知名度的提高，“他们也有胆量并愿意到教会医院求诊治疗…，很愿意与教会医生有交情，有新教会医院落成或启用礼时，地方官员或士绅被请参加祝贺。”^[82]这表明在医学传教士面前官绅的“华尊夷卑”的优越感的丧失。教会在山东的医药活动使很少接触西方文化的山东人接触到西方文化，从而首先对西方有了感性认识，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山东人的对外观念。

4、引导妇女走出家庭走向社会

自古以来，中国妇女没有受社会教育的权利，山东妇女也不例外。妇女禁锢在家庭中，接受的是“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为中心的、封建礼教所规定的道德和行为规范教育。她们很难在社会上拥有受人尊崇的职业。即便有人通过父兄学到医

术或其它技能，但是在鄙视女性的社会环境下，她们很难有机会像男性一样自由从事行医等活动。教会医药活动的开展为近代山东妇女提供了医生和护士两种新职业，这两种职业也是近代中国妇女较早从事、并赢得社会认同的职业。

女子所从事的医生、护士职业，实际上是西方妇女运动的产物。因为从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妇女几经努力获得了与男性一样的习医、行医权。而护士职业则是南丁格尔在克里米亚战争前后创立的新职业。这两种新职业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西方各差会为了教会医疗事业的发展相继派遣女传教士医生来山东，她们的言行对山东妇女产生了较大影响。20世纪以后，特别是民国建立后，男女同校接受高等医学教育已成必然之势。但因传统观念的影响，步骤较慢。以齐鲁大学为例，该校1923年招收女生，但只招医预科的低年级。1924年，北京协和女子医学院并入齐鲁大学医学院后，女子医学院的本科女生开始与医学院的男生同堂上课。“实践证明男女同校学习医学是完全切实可行的。我们并没有遇到任何重大而又不可克服的困难”。^[83]此后，齐鲁大学其它各院系开始招收女生，并最终实现男女同校。

就中国近代最早的护士教育来说，它也是由女医学传教士所开启的。在讲求“男女大防”的中国社会，医院全面使用女性作护士是相当困难的。因此，教会护士教育在很长时期内培养男、女护士以分别照看男女病人。像烟台毓璜顶医院，在他们招收的学员当中，每一期基本上都有一定比例的男生。齐鲁大学护士训练学校在一开始招生时，从山东社会的情况出发，“不得不在护理学校中招收男生，训练男性护士。”面对这一项困难的工作，女传教士们用亲身的工作经历加之以耐心的说服，才使人们认识到护士不但是令人尊敬的一项职业，也为妇女走上独立工作的道路，扫清了障碍，不少父母要求送他们的女儿进入护士训练学校学习。一位权威人士这样评价女传教士创办的护士教育：“在他看来，基督教徒开创护士职业比起介绍现代医学、创办医院更是一个伟大的成就。但是如果没有西方的基督教徒妇女树立的榜样，中国的年轻妇女是不会来的。”^[84]

应该说，教会在山东的医药活动，一定程度上结束了山东女子禁锢在家中不让接受新生事物的落后状态，教会以其特殊的外力把深闺秀阁中的部分妇女引上社会教育的场所，从家庭走向社会，攻击了“女子无才便是德，妇人不学为能”的陈腐观念，为山东培养了最早的医学妇女人才。

5、有利于中医药的研究利用和中西医的交流

传教士医生初到山东时，他们给病人治病用的药基本上采用中草药，但是在用药时却格外小心，这表明西方医学对中国的传统医学是存有偏见的。而西方医学界也曾经指出中国医学的许多知识和技术是和直观的、经验性东西混在一起的，因此很多传教士医生就利用他们的知识对中草药悉心研究，像著名的医学传教士聂会东从草药铺买回中医常用的草药进行药品化学成分的分析，并在研究的基础上对有些中医药的有用价值作了科学的评判。1891年，聂会东对济南136种中药的化学成份、形状、颜色、医学用途等作了详细的研究，指出了一些中医的实际药用价值。如他认为雄黄没有特殊的医用价值，但是硼砂却是一种有用的中药。与聂会东同时来山东传教的章嘉礼曾经肯定地说：“中医制度已经有了几千年的经验，决不可能不留下许多精华。”^[86]不可否认，中医治疗一些病症是十分有效的，有的医学传教士对中医的研究和使用的动力也正是来源于此。传教士对中医的研究和利用表明他们对中医的吸收，同时对西方国家认识到中医的价值有积极作用。这客观上有利于中西医的交流。时至今日，中医已逐步走向世界并在西方国家兴起“中医热”、“针灸热”，表明中国的传统医学已越来越得到世界的承认，在此我们不能抹煞新教传教士们早期在中医西传过程中所做出的贡献。

小 结

近代山东是西医科学的起步阶段。新教传教士利用“医学传教”把西方先进的医疗技术、医事制度带到山东，对山东的医药现代化产生了积极影响。他们在山东开办的一系列医院、诊所，为“缺医少药”的山东民众开启了方便之门。而其传教初期的政治色彩和宗教色彩随着医药活动的开展日益减弱，与山东社会的关系也日趋和谐。尽管教会在山东的医药发展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均衡性，但是在外来侵略不断和国内长期动乱的政治情境下，新教传教士的医药活动为山东培养出了大批优秀的医生，建立了高水平的医学院校，还引导处于禁锢状态下的山东妇女走出家庭走向社会。不可忽视的是，作为中国优秀文化遗产的传统医学也因此而逐步走向世界为西方国家所认识。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性，新教传教士们的医药活动不可避免的打上宗教传播的烙印。

注 释

- [1] 杨懋春：《齐鲁大学校史》，（台湾）《山东文献》 第九卷 第二期，第 160 页。
- [2] 陶飞亚、刘天路：《基督教会与近代山东社会》，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0 页。
- [3] 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17 页。
- [4]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3 页。
- [5] 王铁崖：《中国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 1982 年版，第 95 页。
- [6] 林治平：《近代中国与近代基督教论文集》，（台北）宇宙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38 页。
- [7] 杨懋春：《齐鲁大学校史》，（台湾）《山东文献》 第九卷 第二期，山东文献社出版，第 14 页。
- [8] 陶飞亚、刘天路：《基督教会与近代山东社会》，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18 页。
- [9] Lottie Moon : "A Sketch of the Work of the American Southern Baptist Mission in the Province of Shantung ", R. C. Forsyth Ed. Shantung, the Sacred Province of China in Some of Its Aspect, Compiled and by, Shanghai Literature Society, 1912, PP.229-34
- [10] 孙祚民主编：《山东通史》，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510 页。
- [11] 孙祚民主编：《山东通史》，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512 页。
- [12] 杨懋春：《齐鲁大学校史》，（台湾）《山东文献》 山东文献社出版，第九卷 第三期，第 53 页。
- [13] 陶飞亚、刘天路：《基督教会与近代山东社会》，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18 页。
- [14] 《孙中山全集》第 2 卷，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231 页。
- [15]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中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419 页。
- [16] 孙祚民主编：《山东通史》，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510 页。
- [17] 张立志：《山东文化史研究》（甲编）济南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 1939 年版，第一部分：导言。

- [18] 陶飞亚、刘天路：《基督教会与近代山东社会》，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9 页。
- [19] 《山东省志资料》1962 年第 4 期，第 2 页。
- [20] 罗纳德·L. 约翰斯通著；尹今黎等译：《社会中的宗教》，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10 页。
- [21] 罗纳德·L. 约翰斯通著；尹今黎等译：《社会中的宗教》，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01 页。
- [22] 陈邦贤：《中国医学史》，上海书店 1984 年版，第 185 页。
- [23] 李廷安：《中外医学史概论》，商务印书馆 1947 年版，第 18 页。
- [24] 程之范：《中外医学史》，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60-68 页。
- [25] 陈乐平：《出入“命门”——中国医学文化学导论》，上海三联书店 1997 年版，第 77 页。
- [26] 杨懋春：《齐鲁大学校史》，（台湾）《山东文献》，山东文献社出版，第九卷 第二期，第 14 页。
- [27] 中国教会研究中心、橄榄基金会联合出版：《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21），第 98 页。
- [28] 杨懋春：《齐鲁大学校史》，（台湾）《山东文献》，山东文献社出版，第九卷 第二期 第 14 页。
- [29] 杰西·卢茨著；曾钜生译：《中国教会大学史》，浙江教育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30 页。
- [30] Rev. Hunter Corbett, Ed. East Shantung Mission, the 70 Annual Report of Foreign Mission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S.A. 1907, PP.113.
- [31] 曲拯民：《烟台益文商专》，（台湾）《山东文献》，山东文献社出版，第九卷 第一期，第 38 页。
- [32] C. K. Roys: "Work for Women in Shantung", Donald Macgillivray Ed., the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1914,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Shanghai, 1914, PP.225-32.
- [33] C. K. Roys: "Work for Women in Shantung", Donald Macgillivray Ed, The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1914,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Shanghai, 1914, PP.225-32.

- [34] 《基督教在庞庄》，《德州文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德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1989 年，第一辑，第 297 页。
- [35] 陶飞亚、刘天路：《基督教与近代山东社会》，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09 页。
- [36] W. P. Chalfant: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in Shantung", R. C. Forsyth, comp and ed., Shantung, the Sacred Province of China,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912, PP.235-39
- [37] 陶飞亚、刘天路：《基督教与近代山东社会》，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10 页。
- [38] 杨懋春：《齐鲁大学校史》，（台湾）《山东文献》山东文献社出版，第九卷 第二期，第 21 页。
- [39] 杨懋春：《齐鲁大学校史》，（台湾）《山东文献》山东文献社出版，第九卷 第三期，第 14 页。
- [40] Agnes Orr Kirkland: " Sketch of the English Baptist Mission in Shantung", R. C. Forsyth, comp and ed., Shantung, the Sacred Province of China,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912, PP.262-70.
- [41] F. B. Turner: "The United Methodist Mission Work in Wudingtingfu, Shantung, "F. Rank b. Turner, Comp and Ed., Shantung, the Sacred Province of China,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912, PP.61-2
- [42] Charles R. Stanly: "The Shantung Work of the North China Mission of the American Board", R. C. Forsyth, comp and Ed, Shantung, the Sacred Province of China, Shanghai Literature Society, 1912, PP.239-44
- [43] 青岛基督教会编写：《基督教在青岛 1873-1980》（影印本），第 30 页。
- [44] 青岛基督教会编写：《基督教在青岛 1873-1980》（影印本），第 53 页。
- [45] 杜明德：《临清华美医院小史》，《临清文史资料》第 3 辑，第 181 页、183 页。
- [46] A. G. Ahmed. Comp., ed, and Pub., Pictorial Chefoo,1936, P.153
- [47] 烟台的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烟台市志》，科学普及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85 页。
- [48] 杜明德：《临清华美医院小史》，《临清文史资料》第 3 辑，第 181 页。
- [49] 臧雨亭：《浸信会在山东的医药》，《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29-1930），第 24 页。
- [50] 《华北医院始末》，《滕县文史资料》 第三辑 ， 1987 年，121 页。
- [51] 《华北医院始末》，《滕县文史资料》 第三辑 ， 1987 年，121 页。

- [52] 陶飞亚、刘天路：《基督教与近代山东社会》，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15 页。
- [53] 山东省潍坊地方史志办公室编：《潍城区志》，齐鲁书社 1992 年版，第 728 页。
- [54] 傅乐仁：《论麻风症》，《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14)，第 137 页。
- [55] 陶飞亚、刘天路：《基督教与近代山东社会》，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19 页。
- [56] 张青林，张奇文主编：《山东省卫生志》，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556 页。
- [57] 朱式伦：《齐鲁大学及其附属机构介绍》，《济南文史资料选辑》第 7 辑，第 88 页。
- [58] 山东卫生史志编撰委员会：《山东卫生史志》，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701 页。
- [59] 杰西·卢茨著；曾钜生译：《中国教会大学史》，浙江教育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34 页。
- [60] 陶飞亚、刘天路：《基督教与近代山东社会》，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16 页。
- [61] 郭查理著；陶飞亚、鲁娜译：《齐鲁大学》，珠海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50 页。
- [62] 陶飞亚、刘天路：《基督教与近代山东社会》，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18 页。
- [63] 杨懋春：《齐鲁大学校史》，(台湾)《山东文献》，山东文献社出版，第九卷 第四期，第 60 页。
- [64] 杨懋春：《齐鲁大学校史》，(台湾)《山东文献》，山东文献社出版，第十卷 第四期，第 61 页。
- [65] 陈学洵：《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80 页。
- [66] 陶飞亚、刘天路：《基督教与近代山东社会》，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17 页。
- [67] 杰西·卢茨著；曾钜生译：《中国教会大学史》，浙江教育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39 页。

- [68] 张智康：《齐大医学院生活片段》，（台湾）《山东文献》，山东文献社出版，第九卷 第2期，第159页。
- [69] A. G. Ahmed: Comp., Ed., Pictorial Chefoo, 1936, P.135
- [70] 曲拯民：《烟台毓璜顶医院与护士学校》，《烟台文史资料》第八辑，第22页。
- [71] 郭查理著；陶飞亚、鲁娜译：《齐鲁大学》，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
- [72] 杨懋春：《齐鲁大学校史》，（台湾）《山东文献》，山东文献社出版，第九卷 第四期，第64页。
- [73] 郭查理著；陶飞亚、鲁娜译：《齐鲁大学》，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118页。
- [74] 杰西·卢茨著；曾钜生译：《中国教会大学史》，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45页。
- [75]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蔡永春等译：《中华归主》（中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28页。
- [76] 王鉴：《原齐鲁大学医学院的历史沿革》，《济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229页。
- [77] 陶飞亚、刘天路：《基督教与近代山东社会》，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29页。
- [78] 陶飞亚、刘天路：《基督教与近代山东社会》，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29页。
- [79] 马伯英、高晞：《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文汇出版社1993年版，第405页。
- [80]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蔡永春等译：《中华归主》（中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29页。
- [81] 王鉴：《原齐鲁大学医学院的历史沿革》，《济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230页。
- [82] 杨懋春：《齐鲁大学校史》，（台湾）《山东文献》，山东文献社出版，第九卷 第二期，第21页。
- [83] 王神荫：《齐鲁大学校史简介》，《文史资料选辑》第九、十一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129页。
- [84] 郭查理著；陶飞亚、鲁娜译：《齐鲁大学》，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119页。
- [85] 陶飞亚、刘天路：《基督教与近代山东社会》，第227页。

参考文献

一、史料、文集、档案

- 1、《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
- 2、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1982年版。
- 3、《山东省志资料》1962年第4期。
- 4、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一、九、十一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
- 5、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蔡永春等译：《中华归主》（中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 6、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临清文史资料》第三辑。
- 7、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烟台文史资料》第八辑。
- 8、张青林，张奇文主编：《山东省卫生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 9、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济南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山东省出版总社济南分社1986年版。
- 10、山东卫生史志编撰委员会编：《山东卫生史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 11、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滕县文史资料》第三辑。
- 12、青岛市档案馆编：《帝国主义与胶海关》，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
- 13、山东省潍坊市地方史志编撰委员会编：《潍城区志》，齐鲁书社1992年版。
- 14、中国教会研究中心、橄榄基金会联合出版：《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14-1936）
- 15、山东省龙口史志办公室编：《龙口市志》，齐鲁书社1995年。
- 16、（台湾）《山东文献》社编：《山东文献》，山东文献社出版。
- 17、青岛基督教会编写：《基督教在青岛1873-1980》（影印本）。
- 18、烟台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烟台市志》，科学普及出版社1994年版。
- 19、《私立齐大医院》，齐鲁大学档案9-3-52。
- 20、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山东省志·少数民族志·宗教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 21、政协德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德州文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

东省德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1989 年。

二、论著

- 1、陶飞亚、刘天路：《基督教会与近代山东社会》，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 2、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出版社 1997 年版。
- 3、顾长声：《传教史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 4、李廷安：《中外医学史概论》，商务印书馆 1947 年版。
- 5、罗纳德·L·约翰斯通著；尹今黎等译：《社会中的宗教》，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 6、陈邦贤：《中国医学史》，上海书店 1984 年版。
- 7、陈学洵：《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7 年版。
- 8、李庆胜：《清末民初的山东大学堂》，济南出版社出版 1995 年版。
- 9、郭查理著；陶飞亚、鲁娜译：《齐鲁大学》，珠海出版社 1999 年版。
- 10、林治平：《近代中国与近代基督教论文集》，（台北）宇宙出版社 1980 年版。
- 11、杰西·卢茨著；曾钜生译：《中国教会大学史》，浙江教育出版社 1987 年版。
- 12、程之范：《中外医学史》，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 13、彭益军：《齐鲁大学与近代山东医学教育》，《山东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 3。
- 14、卢平：《西医东渐后我国近代的女子医学教育》，《中华医史杂志》，1999，29（1）。
- 15、朱冬梅：《西方基督教与近代山东女子教育》，《妇运史话》，总第 51 期。
- 16、任银睦：《清末民初基督教在山东的传播与山东的教育文化现代化》，聊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2。
- 17、陈军：《潍坊地区西医的传入》，《中华医史杂志》，1993，23（1）。
- 18、杨化祥等：《近代西洋医学传入烟台概述》，《中华医史杂志》，1995，25（4）。
- 19、朱小俐：《女传教士在山东》，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论文，2001 年 4 月 29 日。
- 20、李传斌：《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与近代中国社会》，苏州大学历史系博士毕业论文，2001 年 4 月。

三、报刊

《济南时报》，2000 年

四、外文资料:

- 1、 R. C. Forsyth, Comp and Ed., Shantung, the Sacred Province of China,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912.
- 2 A. G. Ahmed: Comp, Ed, Pictorial Chefoo, 1936.
- 3、 Donald Macgillivray Ed, The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1914,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Shanghai, 1914
- 4、 Rev. Hunter Corbett, Ed., East Shantung Mission, the 70 Annual Report of Foreign Mission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S.A. 1907.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1] 山东近代西医教育,《科学与管理》,2004年第4期。

后记

经过三年的在职研究生的学习，在进行毕业论文的选题时，在田海林教授的启发下，我将“新教传教士与近代山东的医药事业”作为硕士论文选题。这一选题对我来说颇具挑战性。选题定下后，我尽最大的努力寻觅史料、涉猎相关学科的知识。在毕业论文写作过程中我的指导老师郭大松教授在选题方面帮助我精心的考虑、分析、确定题目，耐心的指导我进行资料的搜集整理、制定写作大纲，成稿时逐字逐句认真批阅，及时纠正了已经出现和可能出现的各种偏差。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正直的人品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成为我永远学习的典范。

同时，要感谢田海林教授，田教授学识渊博，教课认真负责，加上平时布置的作业，均为我们撰写论文打下了良好的理论基础。并在最后论文的选题时，给予了我一定的指引，使我受益匪浅。

另外，山东大学的刘天路教授、山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的王玉霞老师、王英老师在资料搜集过程中提供了很大帮助，在这里特别表示感谢。

最后，我所在单位的领导和同事在我学习和毕业论文的写作过程中，都给予我极大的帮助和支持，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并努力使自己在今后的工作中学为所用。

学生：刘春华

2004年10月16日